“具有爱国主义和忠于信仰的基因”

——外国政要和媒体眼中的习近平

□ 本报特约记者　柯　岩

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教授塔夫罗夫斯基在《习近平：正圆中国梦》导言中用“具有爱国主义和忠于信仰的基因”说明父辈对习近平的影响，他说：“通过对习仲勋变化无常命运的研究，我更好地理解了他的儿子，在‘文革’时期他差一点丢了性命，但他却仍然保持了对社会主义正义事业的信念，相信绘有锤子和镰刀的红色党旗对中国命运是有益的，衷心希望改善自己人民的生活，不能容忍腐败行为寄生在党的肌体里，这使习近平下决心从打大‘老虎’开始行动。”

“家风在习近平身上烙印深刻”

纽约大学终身教授熊玠主编的《习近平时代》一书在谈到习仲勋时说：“在中共的政治元老序列中，习仲勋并不处于核心位置——他并非来自与毛泽东最为密切的湘楚之地，没有参加过长征，也不是党内运动中的风云人物。他最为人称道的，是正直、坦诚、务实、坚韧，不居功，敢于承担风险，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对于中共党内‘左’的倾向始终坚决反对。”“这位出身贫寒、经历艰辛的领导人，对于子女要求甚严，从不让自己的公务车搭载家人，孩子们住寄宿学校，周末回家都是自己乘公共汽车。”习近平“像父亲一样，冷静、有控制力、从不抱怨”。“家风在习近平身上烙印深刻。”“他继承了父亲实事求是、节俭诚朴的品格，并直截了当地呈现在施政方略的每一个细节之中。比如，他中止了春节期间国家领导人下基层的惯例——工作热情不必非得体现在这个中国最重要的假日，地方干部也可以安心与家人团聚；他简化了高层领导出行警车开道、中断交通的安保环节，并且放弃小轿车，集中乘坐面包车，而他的父亲以中央书记处书记之职去地方调研时，曾严肃制止了当地警车鸣笛开道的做法。”

法国中国问题专家阿让·安德烈在《习近平：红色中国的下一代》中说：“晚上，习仲勋经常和他的孩子们一对一地谈话，晚饭时间也是他教育孩子的机会。习近平的父亲经常引用孔夫子的话，包括著名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强烈影响了习近平。有时他父亲还用农民的艰苦生活教育孩子们吃饭要吃干净，坚持让孩子们过一种俭朴的生活。有时候他们也会向父亲的秘书张志功要点零花钱买糖果或去看电影，但总体上看他们的生活是很朴素的。”“他们的父亲要求家人的行为要做好榜样。他们的妈妈齐心也不断向他们灌输节俭的观念，男孩们要穿姐姐们穿过的衣服和鞋子。齐心在她的回忆中提到，习近平曾经为穿他姐姐的旧鞋子而受到同学们的嘲笑，父亲就让把花鞋染黑了穿。”

《习近平：正圆中国梦》一书称：“习仲勋在北京时仍保持着在陕甘宁边区养成的作风，在日常生活中勤奋、谦虚，制定和实施决策时把握分寸合理。习仲勋与处于领导岗位上的大多数延安老兵保持着同志般的关系。”“遗传学是科学，它的规律是无法改变的。但是不是还有另一种可以预先决定亲属有相似政治命运的遗传学呢？了解了习近平主席的生活和升迁之路，研究了他父亲生活和斗争中的一些事件之后，就可以相信这一点了。”

“受到他父亲理想主义信念的强烈影响”

塔夫罗夫斯基在《习近平：正圆中国梦》一书中说：“我对中国现今领导人习近平的了解是从他父亲习仲勋的命运开始的。习仲勋坚信正义的力量，早在青年时期就已成为职业革命者；他在20年的游击战生涯中一直坚持自己的理想，不止一次地险些遭受敌人或朋友的子弹。作为建立新中国的一名元老，他并未因身居高位而‘腐化’，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也没有整过人。他依然保持了青年时期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信仰和建设祖国的强烈愿望。他从中国西北革命老区走来，在中国南方建立了经济特区，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窗口和引擎。”“在他的儿子习近平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前，我对习仲勋研究不多，甚至并不了解他非凡的个人生活的全部。只是从俄罗斯、中国、西方学者的著述中了解了习仲勋生活中的一些大事，在与熟悉他的一些人交谈后，我勇敢地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个英勇的、充满戏剧性的人属于新中国历史上伟大活动家之列的人物。在20世纪的转折关头，他经常与举世闻名的人物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站在一起。”

美国之音电台网站2012年12月7日报道称，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被誉为深圳特区的开荒牛。习仲勋于1978年到1980年，冒着被指控“走资本主义”邪路的压力，向邓小平索要先走一步的尚方宝剑，请求建立经济特区，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杀出一条血路”。《习近平时代》称，“对于习仲勋参与创办经济特区的贡献，今天有人如此评价：中国能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他走的这一步意义重大”。

阿让·安德烈在《习近平：红色中国的下一代》中说：“年轻的习近平受到他父亲理想主义的强烈影响，他对他父亲的勇气、理想主义十分敬佩。”美国之音电台网站在习近平首次以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身份离京当天报道，选择深圳这座具有“改革开放排头兵”称号的南方城市作为首次出巡地点，引起广泛关注与解读。《华尔街日报》称，“有分析人士将习近平此行视作向其父习仲勋致敬”。

2013年10月纪念习仲勋诞辰100周年时，英国BBC报道称：“习仲勋是中国共产党内著名的改革派，中国纪念习仲勋，不仅是出于中共纪念老一辈革命家的传统，也是在即将召开的中共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夕，凝聚党内共识，坚定改革信念。”

“从父辈手中接过了历史的接力棒”

《习近平：正圆中国梦》一书写道，时年66岁的老革命习仲勋决定在偏远的六七千人口的深圳建造一个新的城市。当时，这里的居民唯一感到自豪的是一幢五层建筑。但很快“深圳奇迹”就开始了，也许没有它，也就没有“中国奇迹”。特区政府从北京那里获得了高度自治权，确定了较低的所得税税率，简化了创办合资企业、办签证、利润汇出和外汇兑换的手续。后来，分析经济特区成功原因的学者们将之比作一个自由经济的“绿洲”，比作吸收新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吸尘器”，比作“通往外部世界的窗口”。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但为经济特区奠基、盖最初几层楼的是习仲勋，可以称其为“建设工程主任”。

2013年12月1日英国《卫报》刊文《习近平：世界所不了解的中国领导人》称，“习近平的父亲以温和稳健和坦率敢言而著称”，“习近平继承了他父亲的改革风格”。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教授伯尼·柳，曾在以习仲勋副总理为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访苏时担任过翻译，她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苏联领导层以及代表团成员在工厂、街头遇到的普通民众对中国代表团的热情友好。同时，习仲勋也表现出他的友好态度。他几乎总是面带微笑，说话尽量用短句子，以便译员翻译。和他一起工作很轻松、很惬意。我也要指出习仲勋很有文化修养，举止优雅。”2013年3月她作为七名俄罗斯中国问题专家之一参加了与习近平主席的会面，伯尼·柳在谈自己的印象时说：“在那些事件过去54年后，安排我和习仲勋副总理的儿子——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会面，我马上就注意到了两位国务活动家的相似之处：同样的身材，只是儿子比父亲略高，同样和蔼可亲的面容；对交谈者的同样目光，这种目光只有文化素养很高、有巨大内在力量的人才有。”当习主席得知我很多年前曾是他父亲习仲勋率领的中国代表团的翻译时，他说：“这是天意。”在同中国问题专家交谈时，习近平讲述了自己父亲的生活经历，强调父亲是他生活上的高尚楷模，他说：“我们接过了历史的接力棒，我们要满怀敬意地将其举起。”

伯尼·柳还谈到，“在2013年12月2日俄中友协和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举行习仲勋诞辰100周年的纪念会上，当得知2001年父亲88岁生日时习近平给生病父亲的拜寿信中的‘儿子的誓言’时，我们的内心深处受到了触动。他对生病的父亲说，儿子保证要用毕生精力来完成父亲为之奋斗的目标，忠于职守，谦虚谨慎，关心家庭与朋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访问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不久以前出访俄罗斯——父子作为伟大中国的使者的出访之间，无疑存在着极大的继承性。习近平从父辈手中接过了历史的接力棒，他们的目标都是为了发展和深化我们两国、两国人民的合作和睦邻关系。我祝愿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践行中国梦的道路上取得成功！”

以新的发展理念引领新的发展实践

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新的发展理念，用新的发展理念破解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这是我们党推进发展的一个鲜明特点，也是事业获得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必须直接奔着当下的问题去，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着力把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落到实处。

□ 秦　刚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在深入分析我国现阶段发展环境基本特征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并阐述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些新的理念的提出，是实践的呼唤、现实的要求，也是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同时也贯穿着强烈发展意识和问题导向，具有明确的针对性。以新的发展理念引领新的发展实践，才能继续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

强烈的发展意识和鲜明的问题导向

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也是当代中国的首要任务。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经济社会发展到了新阶段，也会迎来新问题。面对新的发展问题，提出新的发展理念，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是推动发展实践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立足于基本国情，把握社会的主要矛盾，着眼于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期盼，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经过30多年的发展和积累，我国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国际地位显著提升，人民生活大幅改善，国家和社会面貌发生新的历史性变化。发展是第一要务，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已成为我们党和国家的坚定信念，也成为整个社会的最大共识。空前的快速发展，带来欣欣向荣的局面，但同时也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要让中国变成一个更加强盛的国家，让13亿多人都过上更加富裕美好的生活，难题依在，任重道远，还需要我们付出长期的艰苦努力。

从我国发展的进程来看，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但城乡区域发展还很不平衡；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但经济结构的调整、发展方式的转变还没有完成；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有了较大提高，但还有大量贫困和低收入人口存在；社会事业发展有明显进步，但就业、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全社会对生态文明建设有了更高的认识，但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环境污染、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发展现阶段难以避免的，有的是发展方式和发展观念上的偏差造成的，有的是因体制机制不完善导致的，也有的是长期遗留没有及时得到解决加剧的。

从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来说，我们面临着更加复杂多变的形势。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新的变革，我国发展有了更大的机遇和有利条件，但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竞争和挑战，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明显增多。中国发展同世界发展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日益加深。面对中国的和平崛起，一些发达国家对中国发展的戒心增大，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发展也产生一些疑虑和担忧。与此同时，世界各国围绕资源、能源、技术、人才也展开日趋激烈的竞争。这些国际问题同国内的问题交织在一起，使中国的发展面临更大的压力和更多的挑战。

在这样的发展态势下，要赢得发展的主动和优势，增强自身发展的竞争力和抗击力，就要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持用新的发展理念、新的发展思路，有效化解各种矛盾和风险。

内涵丰富的新理念新举措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丰富了发展的内涵，拓展了发展的视野，明确了发展的新要求。这些新的理念，集中体现着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发展经验，深刻反映了我们党对我国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同时也充分表现出我们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和目标的自省自信。新的发展理念，为我国未来发展指明了更清晰的思路和更明确的路径，是我们引领发展新常态、开创发展新局面的基本遵循。

这五大发展理念，紧密联系、相互贯通，是一个系统性协同性的整体。其一，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要突破自身发展瓶颈、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必须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培育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构建发展新体制，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激发调动全社会的创新激情。其二，协调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坚持协调发展，要着力推进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推进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协调发展，在协调发展中拓宽发展空间，在加强薄弱领域中增强发展后劲，形成平衡发展结构，增强发展整体性。其三，绿色是永续发展的条件。坚持绿色发展，是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也是破解我国资源环境约束的必然要求。要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质量的增长点，成为展现我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其四，开放是促进发展的动力和活力之源。坚持开放发展，要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不断拓展发展空间，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其五，共享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本质要求。坚持共享发展，要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体现着发展目标和问题的统一、全面与重点的结合，国内和国际的统筹。这些理念，既遵循着经济规律、自然规律，也遵循着社会规律，是科学发展的集中体现，也是可持续发展、包容性发展的集中体现。坚持和贯彻这些理念，有助于把中国的发展带入一个新阶段，提升到一个新水平。



贯彻落实的关键和保障

贯彻落实新的发展理念，必须有认识上的提高。要按照新的发展理念，去认识什么是发展，去思考怎样发展。我们是在一个新的起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我们的认识和观念也必须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要改变那种主要把劳动力以及投资作为发展驱动要素的做法，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来促进新的发展；改变那种重城市轻农村、重经济轻社会、重物质轻精神等发展倾向，注重发展的整体效能，提高发展的平衡性；改变那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方式，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局面；提高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认识，更好地促进发展的内外联动；改变那种为发展而发展、见物不见人的情况，坚持以人为本，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发展的着眼点。没有认识上的提高，没有观念上的转变，新的发展理念的落实就会大打折扣。

贯彻落实新的发展理念，必须有切实可行的新举措。贯彻落实新的发展理念，重在实践，贵在实效，必须要有切实的举措、具体的措施。其总的要求就是，要从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为出发点，探索和完善符合实际的新办法、新措施，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当前发展的突出问题，着力解决人们最关心、最迫切的实际问题。应立足于当前、考虑长远，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只有采取更加有力的新措施，确定符合各地实际的发展规划，才能使新的发展理念的基本要求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并体现在改革发展的各个环节，体现在经济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领域。

贯彻落实新的发展理念，必须有相应的制度机制作保障。制度也就是做事的规程，它的作用就在于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总结以往的经验，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问题，许多事说得挺好，但落实得不好。这其中的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但缺少制度保障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要积极推动制度创新，形成贯彻落实新理念的长效机制。这不仅是现实的需要，也是长远的要求。加强制度建设，还要抓好制度的贯彻落实。很多时候，规章制度之所以没有发挥应有的效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执行不力、落实不够，导致好的制度形同虚设。制度机制问题不解决，单靠思想作风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

贯彻落实新的发展理念，必须抓好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各级领导干部就是我们党的执政骨干，是我们党大政方针的执行者、落实者。领导干部对新的发展理念的认识和把握程度，直接影响到新的发展理念的落实程度。领导干部应努力把新的发展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对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对个人所担负的责任，要有明确的认识。只有增强贯彻落实的责任感、使命感，才能不断提高贯彻落实的意识和能力。

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

国际视野下的道路自信

□ 佟德志　郝　炜

在西方，预言中国崩溃的学者从来不乏其人。早在2001年，就有人自信满满地宣称，中国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最多只能维持5年。然而，15年过去了，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不仅没有崩溃，反而越来越强壮：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中国政治社会各个方面越来越有活力。中国人有充分的理由充满道路自信。

时至2015年，居然还有人重弹“中国崩溃论”。华盛顿大学教授、美国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沈大伟发表《中国即将崩溃》一文。“中国崩溃论”再次回到人们的视野。

一般认为，在国外研究中国的学者当中，沈大伟属温和派。在2008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一书中，尽管并不认同中国政治体制，沈大伟还是对中国共产党的适应能力和执政能力表示乐观，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收缩与调适，能够应对积弊。然而，7年之后，沈大伟为何又抛出“中国崩溃论”呢？

如果对沈大伟的言论全面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多年来，沈大伟一直将研究集中在中国的“问题”上。早在1993年，他就曾经发表文章推介宣扬“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的书籍。在1996年发表的题为《遏制中国还是合作》一文中，沈大伟认为中国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领域均存在着严重问题，持续的衰退过程不可避免。2007年，沈大伟也曾发表类似观点的文章。

在《中国即将崩溃》一文中，沈大伟列举了五个方面的理由，即经济精英的失望、政治压制的加强、官场的疲态、反腐败运动和严峻的经济压力。这些观点和论据确实乏善可陈，了无新意。仅举一例就可以看到他的论证缺乏内在逻辑。沈大伟认为富人将孩子送到国外就学是对国内教育体制的控诉，由此得出经济精英对国家失望的判断。实际上，英法德日等国都有大量学生在美国留学，沈教授并没有说这些国家国民对自己的体制失望，也没有预言这些国家崩溃。

那么，人们应该如何看待一直“唱衰”中国的沈大伟及其“中国崩溃论”呢？这可以从沈大伟自己的研究中找到答案。2001年，沈大伟发表文章宣称，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正当性依赖于经济力量、国家主义和精英统治的准则，如何建立一个更为开放和基于选民的政治体系、更好地应对中国的国际责任、提高生活质量以及制定更加开放和回应性的政策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由此可以看到，沈教授担忧的是，中国能不能走上西方道路；而他预测的中国崩溃，就是中国没有走上西方道路。

在没有走上西方道路这一点上，沈教授还真是说对了，中国不可能照搬照抄西方道路，而是要走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就要求在根本性的问题上，我们决不能犯颠覆性错误。